

## 借古鉴今 打造精品

曹 之

(武汉大学 信息管理学院, 湖北 武汉 430072)

重视著书立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。浩如烟海的古籍中不乏学术精品, 这些学术精品的产生与古人的传世意识和精品意识密切相关。

曹丕在《典论·论文》里说过:“盖文章, 经国之大业, 不朽之盛事, 年寿有时而尽, 荣乐止乎其身, 二者必至之长期, 未若文章之无穷。是以古之作者, 寄身于翰墨, 见意于篇籍, 不假良史之辞, 不托飞驰之势, 而声名自传于后。”这是古人传世意识的最明确的表述, 刘勰、刘知几等人都有类似的说法。为了作品传世, 古代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: 汉代司马迁在李陵事件中, 蒙受了深重的灾难, “交手足, 受木索, 暴肌肤, 受榜箠, 幽于圜墙之中”, 面对残酷的宫刑, 是引决自裁, 还是忍辱负重? 司马迁选择了后者。他在《报任安书》中说:“所以隐忍苟活, 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, 恨私心有所不尽, 鄙陋没世, 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。”只要作品能够“藏之名山, 传之其人”, “虽万被戮”, 也不后悔。司马迁的传世意识于此可见。唐代白居易的传世意识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: (1) 自编诗集 10 余次。为了防止丢失, 每隔数年, 白居易就要及时整理自己的作品, 编集成册。其编集次数之多, 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仅见的。(2) 每次自编诗集之后, 都要抄写复本。太和三年(829 年)编《刘白唱和集》抄了两个复本; 开成四年(839 年)编《白氏文集》, 抄了 3 个复本; 会昌五年(845 年)编《白氏文集》, 竟然抄了 5 个复本。为什么要抄复本呢? 只有抄写大量复本, 才能确保永久流传。(3) 将复本珍藏寺院。如开成四年(839 年)所抄的 3 个复本, 一本藏东都圣善寺钵塔院律库中; 一本藏庐山东林寺经藏中; 一本藏苏州南禅院千佛堂内。会昌五年(845 年)所抄的 5 个复本, 其中 3 个复本仍然分藏以上 3 所寺院。为什么要藏到寺院呢? 因为寺院远离红尘, 几与外界隔绝, 比藏在其它地方要安全得多。(4) 白居易的“年岁诗”和“官秩诗”也体现了他的传世意识。据统计, 白居易作品中有 77 处“年岁诗”和“官秩诗”, 如“己年四十四, 又为五品官”, “身为三品官, 年已五十八”等。为什么要把年岁、官秩写入诗歌呢? 当然是为后人着想, 为后人研究他提供可靠的资料。也就是说, 白居易拿笔写诗的时候, 已为后人研究他做好充分准备, 以免后人东奔西跑, 找不到资料。(5) 晚年特制柏木书柜, 收藏文集。其《题文集柜》诗云:“破柏作书柜, 柜牢柏复坚。收贮谁家集? 题云白乐天。我生业文字, 自幼及老年。前后七十卷, 大小三千篇, 诚知终散失, 未忍遽弃捐。自开自锁闭, 置在书帷前, 身是邓伯道, 世无王仲宣。只应分付女, 留与外孙传。”这是白居易生前为了永久保存文集所进行的最后一次努力。在封建社会, 只有男孩才是父母财产的法定继承人, 而白居易有女无男, 也就意味着文集无人可传。尽管如此, 晚年的白居易还是自我解脱, 用坚实的柏木做了一个书柜收藏文集, 将来让出嫁的女儿“留与外孙传”, 也不失为一种流传方式。如此种种, 都说明白居易具有强烈的传世意识。宋代郑樵著书千卷, 千里迢迢, 抱着书稿从福建莆田老家跑到临安献给皇帝, 希望将其收藏在国家图书馆。他在《上宰相书》中说:“樵暮龄余齿, 形单影只, 铅槧之业甫就, 汗简之功已成, 既无子弟可传, 又无名山石室可藏。每诵白乐天‘恐君百岁后, 灭泯人不闻。赖中藏秘书, 百代无湮沦’之句, 未尝不呜咽流涕。会兹天理不负夙心, 仰荷钧慈果得就秘书省投纳。蓬山高迥, 自隔尘埃, 芸草芳香, 永离蠹朽, 百代之下复何忧焉。”可见, 他此举的目的就是为了“赖中藏秘书, 百代无湮沦”, 说明郑樵的传世意识也是很强烈的。

传世意识只是一种主观愿望, 能否传世, 还要看作品本身是否精品, 尚需读者的选择, 历史中的评判

古往今来的不少学者深谙此理,为了著作传世,千方百计地打造精品,呕心沥血,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正如司马迁所说:“盖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;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;屈原放逐,乃赋《离骚》;左丘失明,厥有《国语》;孙子膑脚,《兵法》修列;不韦迁蜀,世传《吕览》;韩非囚秦,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;《诗》三百篇,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。”是的,古代不少学术精品,都是“发愤”之作。司马迁《史记》由其父子相继完成,前后历经17年。司马迁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,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,终于完成了这部万古称颂的传世佳作,被鲁迅先生誉为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《离骚》”。白居易为了打造精品也付出了辛苦的劳动。他的诗歌经常念给老太太听,听不懂就反复修改,直到听懂为止。他的诗稿写成以后,总是不断修改,“竟有终篇不留一字者”。他要求后人在编其作品时,把那些“率然成章”的不经意之作,一概删去,毫不留情。他曾对好友元稹说,“凡人为文,私于自是,不忍于割截,或失于繁多。其间妍媸,益又自惑,必待好友有公鉴无姑息者,讨论而削夺之,然后繁简当否,得其中矣。”这就是说,诗文写好之后,必须请毫不姑息迁就的诤友“讨论而削夺之”,才能提升作品的质量。白居易不愧为唐代著名诗人,他创作了大量诗文精品,与元稹、刘禹锡并称,影响一代诗风。郑樵为了打造精品,谢绝人事,隐居夹漈山,结茅苦读30年;10年攻读经旨之学,3年攻读礼乐之学,3年攻读文字之学,6年攻读天文、地理等学,8年攻读讨论、图谱等学,以30年之功完成了《通志》这部学术名著,其中《通志·校讎略》对古代书目编纂进行了全面总结,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。他的“会通观”和“辨章学术,考镜源流”的实践活动,对指导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。在中国古代,像司马迁、白居易、郑樵这样打造精品的例子还有很多。一部中华民族的学术史,就是代代学人打造精品的历史。“十年磨一剑”正是古人打造学术精品的形象写照。他们为了打造学术精品,付出了毕生的时间和精力,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。扬雄《方言》用时21年;王充《论衡》用时31年;班固《汉书》用时28年;许慎《说文解字》用时21年;陈寿《三国志》用时23年;杜佑《通典》用时35年;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用时18年;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用时40年;洪迈《容斋随笔》用时20年;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用时30年;顾炎武《日知录》用时40年;阎若璩《古文尚书疏证》用时30年;王鸣盛《十七史商榷》用时24年;钱大昕《廿二史考异》用时52年;桂馥《说文义证》用时40年;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用时30年;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用时30年;王筠《说文句读》用时30年。实践表明,传世意识和精品意识是互为因果的关系:一方面,传世意识可以激发精品意识,才能真正打造学术精品;没有传世意识,就不会有精品意识,也就不可能打造学术精品。另一方面,精品意识造就学术精品,才能真正达到传世的目的;没有精品意识,就不可能打造学术精品,也就不可能达到传世的目的。那些为了混职称、捞稿费的人,既无传世意识,就不可能以“十年磨一剑”的严谨治学态度打造精品,就只能大搞“短平快”,甚至以抄袭为能事,一年磨十剑,生产覆瓿之物,也就不可能传世。疾行无善步,书多必不工,前人的教训值得注意。

为了打造学术精品,古代不少学者迟迟不肯将作品付诸梨枣,竟至于生前不得获睹作品传世,含恨九泉。司马迁死后18年,《史记》才由其外孙杨恽公布于世;徐光启死后6年,《农政全书》才得以付梓刊行;李时珍死后3年,《本草纲目》才得以出版发行。抚今追昔,感慨万千:古人著书皆用手写,几十年如一日,篝灯呵冻,露钞雪纂,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,甚至死时还看不到自己的劳动成果。今人手敲键盘,

, 。 : , ? , 。 , , , , ( , )